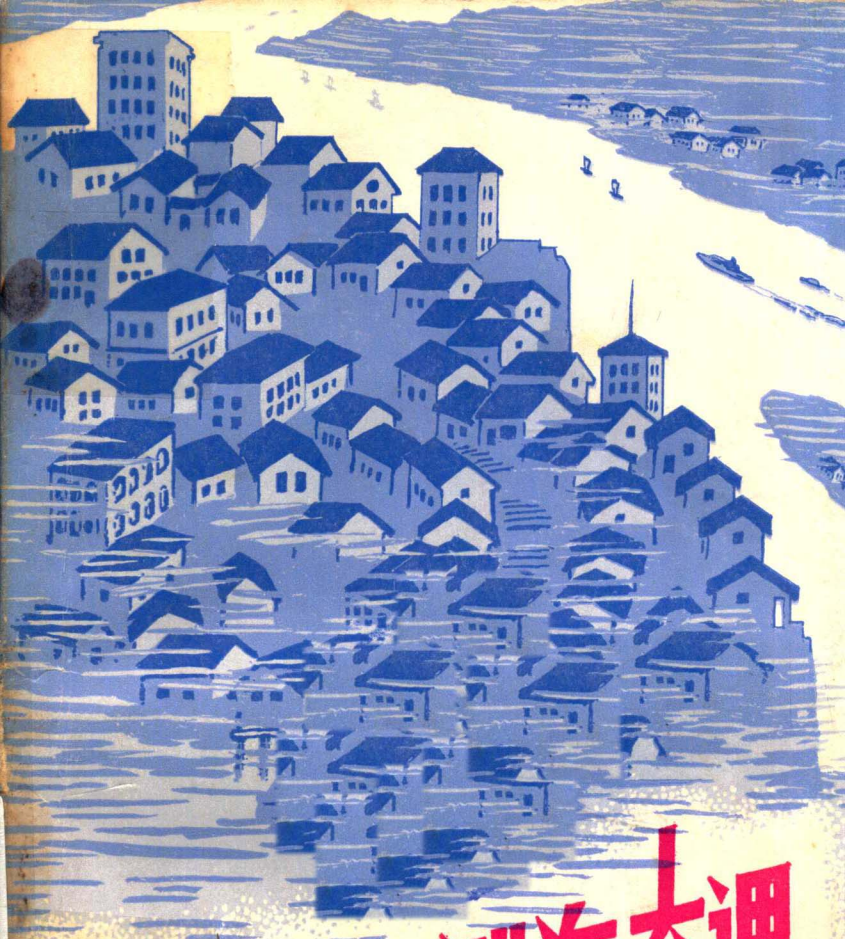




中国黑室—谍海奇遇

〔美〕亚德利 著

郑钧、建东 译

中国黑室

——谍海奇遇

(美)赫伯特·O·亚德利 著

郑钧 建东 晓平 黄力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五月

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

An Adventure in Espionage

Herbert O. Yardle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83

(内部发行)

中国黑室——谍海奇遇

(美)赫伯特·O·亚德利 著

郑钧 建东 晓平 黄力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01工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1/32·印张 7 $\frac{5}{8}$ ·字数164,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5319·40 定价: 1.25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一八八九年——一九五八年）是美国最早的密码破译机关——“美国黑室”的主要创始人。一九三八年九月至一九四〇年七月，蒋介石曾聘请他到重庆担任军统局顾问，培训破译学员，参与创建密码破译机关——“中国黑室”。一九四一年，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书稿，但被美国国务院禁止出版。直到四十二年后（一九八三年），该书才得以付梓，同时增加了美国畅销书《迷宫——揭开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秘密》的作者詹姆斯·班福德撰写的前言，以及亚德利的遗孀埃德娜·拉姆赛尔·亚德利所写的《回忆美国黑室》一文。

亚德利在本书中不仅记述了他亲自参与的破译密电、抓捕日特、培训间谍等等活动，而且对当时的社会黑暗——达官显贵的骄奢淫逸和卖淫、赌博、吸毒等丑恶现象的盛行——也有所揭露。此外，书中还描述了日机轰炸重庆的暴行和生活在战时重庆的形形色色的外国人的各种活动。作者对于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的命运不无同情，但又大肆渲染中国人“愚昧无知”，并对国共两党之争缺乏明确的是非观念。对此，读者自能鉴别，这里不再赘述。现将该书略加删节后译出，供内部参考。

目 录

前言(詹姆斯·班福德)	(1)
人物表	(18)
中国黑室	(1)
回忆美国黑室(埃德娜·拉姆赛尔·亚德利)	(237)

前 言

一九五二年，杜鲁门总统极其秘密地创建了自由世界最庞大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它在华盛顿市以北二十英里处的乔治·G·米德堡安营扎寨，占地一千多英亩。全世界许多私人、商业、外交和军事电信，都被它悄悄地弄进了一座隐蔽的城市。那里有二十多栋用砖瓦、玻璃和水泥建成的大楼，其中的一栋大楼——总部业务大楼很快就成了整个联邦政府中仅次于五角大楼的庞大建筑物。

在总部业务大楼的地下深处，集中了全世界为数最多的电子计算机。这些超级机器的占地面积不用平方英尺计算，而按英亩计算。这里有许多用激光记录了信息的极薄的光盘（每盘可容纳一千亿比特以上的信息），以及成千上万英里长的磁带，好似乔治·路易·博奇斯童话里的浩瀚书库，藏有地球上的全部知识和信息，而且都令人莫测高深地加了密。

为了破译这些错综复杂的密码，国家安全局借助了克雷-1型之类的电子计算机和激光印字机。克雷-1型电子计算机的记忆装置每秒钟可以传送多达三亿二千万个字，相当于两千五百本厚达三百页的书。激光印字机能以每分钟二万二千行的速度将这些字印到无数英里长的纸张上。更有甚者，国家安全局的研究与工程办公室很快就会将约瑟夫森隧道结技术、磁泡、模拟光学计算技术和光声互作用

与电荷转移装置之类的奇异设想付诸实践，从而将使运算速度达到每秒钟一千万亿次以上。

然而，这一切均发端于一位除了敏捷的才思和远大的目光以外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很久以后，才出现了克雷-1型计算机乃至国家安全局。这位年轻人就是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

在间谍和破译工作的灰暗世界里，赫伯特·O·亚德利好似一辆崭新的考德尔牌汽车那样光灿夺目。他是修道士领地上奔放不羁的精灵。一八八九年四月十三日，他出生在印第安纳州西南部的小镇沃辛顿，后来居然掌握了破译外国密表 and 密本的才能。这种才能很可能来自一项远不是那么秘密但又同样很难掌握的（可能还更为有利可图的）业余爱好——扑克游戏。在竞选高中班长、编辑校刊和担任橄榄球队队长之暇，他时常出入一个叫做“蒙蒂寓所”的沙龙，听老萨尔蒂·伊斯特和蒙特·马尔讲牌经，或者混迹于沃辛顿的其他十个沙龙和三家赌场之中。

高中毕业后，亚德利只上了一年芝加哥大学就回到沃辛顿当铁路报务员。他是从他当铁路职工的父亲那里学会干这一行的。没过多久，枯燥无味地拍发催货单和订座单就开始使他心灰意冷了。一九一二年，二十三岁的亚德利把电键交给别人，登上了驶往华盛顿联邦车站的列车。

十一月十六日，亦即抵达华盛顿后不久，亚德利就又阅读起电报来了。不过，窗外的景色已不是印第安纳州平展展的原野，而是白宫南草坪上的网球场了。他当上了国务院里周薪十八点七五美元的机要员，成为美国外交活动的一名沉默的旁观者。然而，橡木桌上嘀嘀嗒嗒作响的共

振器和蜂鸣器使他听着听着就不由地很想知道：还有多少沉默的旁观者可能正在抄收和译解这些高度机密的公文？他明白，其他国家正在这么干。接着，一个问题闯入了他的脑海：“难道美国就不该雇上一批‘破译员’去译解别国的密本和密表吗？”他后来写道：“当我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时，我已经有了答案……并把它作为终身追求的目标。我将为密码学贡献一生。”

亚德利阅读了国会图书馆中少得可怜的几部有关著作，接着就开始用国务院自己的电报练习破译。使他惊讶不已的是，自己竟能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译解了总统特使豪斯上校发给威尔逊总统的私人密码电报。他确信，既然他能如此轻而易举地译解美国的密码，别的国家也能办得到。于是，他将此事报告了上司戴维·萨蒙。萨蒙大为震惊，很快就拿来另一种密码让他试试。亚德利一会儿就把破译结果交给了萨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亚德利从国务院调到了陆军部，并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组建了军事情报处第八科(MI-8)，负责处内一切与密本及密表有关的工作。这是破译部门悠久历史上的第一代机构，最后终于发展成了今天的国家安全局。

亚德利中尉(后来晋升为少校)不久就用事实证明了破译机构的价值。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战时，MI-8已经译解了外国政府的一万零七百三十五份电报，成就确实惊人。战争结束时，亚德利在巴黎，试图促使法国的“黑室”给予更大的合作。上级决定，他应留在法国首都，掌管出席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的密码组。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八日，赫伯特·亚德利回到美国，

并且开始为在和平时期继续进行 MI-8 的破译活动而奔走呼叫。他呈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一个密码组织，聘用五十名密码专家和机要员，由他挂帅，预算为十万美元。几天之内，国务院和陆军部都同意为这个秘密机构提供经费。于是，五月二十日，美国的“黑室”诞生了。

“黑室”打着商业电码公司的旗号隐匿在东三十八街三号一座四层高级楼房里，并把日益富于侵略性的日本的密本和密表体制造为主要目标。亚德利立下了军令状：一年之内破译这些密码，否则就辞职。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获得成功，从而创造了美国密码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之一。

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华盛顿裁军会议期间，人们充分看清了亚德利的突破所具有的宝贵价值。这次五国会议的目的是为航行在全球各大洋上的战舰总吨位规定限额。国务院的主要奋斗目标是日、美海军总吨位的比例限定为六比十。日本表面上坚持七比十，而亚德利的“黑室”却知道实际上并非如此。通过截收和译解东京与日本谈判代表之间的往来电报，亚德利已经掌握了东京的底牌：必要时可降到六比十。国务院按照亚德利的忠告拒不让步，而东京则不出所料，终于表示屈服。

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裁军会议结束，“黑室”也开始走向倒闭。由于通过了保障通信秘密的新法律，加上联邦政府与西部联合电报公司之间闹纠纷，“黑室”的秘密电报来源濒于枯竭。与此同时，随着战争和裁军会议从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国务院开始削减亚德利的预算。这一招特别厉害，因为“黑室”的大部分经费这时都是由国务院提供的。

到一九二四年，亚德利的预算减到了只有原先的十万美元的四分之一，工作人员裁得只剩下可怜巴巴的七个人，宽敞的市区办公楼也换成了范德比尔特大道五十二号办公楼里的两间斗室。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最终决定“黑室”死亡命运的，不是它受到的冷遇，而是一篇义愤填膺的道德说教。

一九二九年三月，赫伯特·胡佛入主白宫，保守派人士亨利·L·史汀生接掌国务院。两个月之后，这位新国务卿发现了“黑室”，并且大发雷霆地予以抨击。当时，他说：“君子不看他人的信件。”这句话无疑已经成了美国密码史上常被引用的名言。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午夜，“黑室”关门大吉。

对于亚德利说来，情况是再糟糕不过的了。他不仅失去了工作，除了破译外国密码之外又别无所长，而且时值股票市场崩溃，大萧条已经开始。于是，他卷起铺盖回到沃辛顿家中。南印第安纳并不比纽约更需要破译员，身无分文而又要养活妻子和一个儿子的亚德利感到走投无路了。但有一件事可以干，那就是写一部宣扬担任“黑室”首脑期间所创造的丰功伟绩的书。

亚德利的著书决定不是轻率地作出的。他曾在信中对一位友人说：“大战以来，我一直为反对泄露与密本及密表有关的任何情况而奋斗不懈。理由很明显：这种泄露会使别国政府知道我们的本事，从而使我们的工作更难进行。”

不过，亚德利辩解道：现在情况变了，美国已经不再拥有破译机构，也不再从事破译勾当，那么，这本书会伤害谁呢？事实上，他还断定，出版这本书甚至会起好作用，亦即迫使国务院重新考虑它作出的关闭“黑室”的不明智的

决定。

在纽约一位出版代理商乔治·T·拜伊的帮助下，亚德利开始了作家的生涯。起初，他的这部著作的摘要分三次在一九三一年四、五月份的《星期六晚邮报》上连载。六月一日，由鲍勃斯-梅里尔公司出版的《美国黑室》问世，并且成了美国文学史上争议最大的著作之一。

公众踊跃争购，评论家们纷纷叫好。一位评论家赞扬该书是“美国人所写的战时和战后初期秘史中最为轰动的著作”。最近，密码专家兼作家戴维·卡恩写道：“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它是我看过的书中最惊心动魄的杰作之一。”

在华盛顿，政府冷峻地否认亚德利所写的一切，但是官员们私下里却大为恼火。他们想起诉，后又作罢，因为有人告诫他们：这样做不仅会泄密，而且会自找难堪。他们也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阻止该书出版的先例。

亚德利成了名噪一时的人物。在那个很少有作家到处旅行的时代，他却奔走于全国各地，大肆宣扬“黑室”的杰出成就，并且警告说：如果没有“黑室”，前途就会黯淡无光。后来，请他演讲的人慢慢地少了，他又有了新打算——写一写只有他讲得出来的华盛顿裁军会议的秘闻，包括截获到的东京和在华盛顿参加会议的日本谈判代表之间的电报副本。在业余作家玛丽·斯图尔特·克卢兹的协助下，亚德利在两个月之内写出了长达九百七十页的《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日本外交秘密》。

然而，鲍勃斯-梅里尔公司害怕得要命，不但拒绝收稿，而且还由总经理 D. L. 钱伯斯通知司法部长：新手稿中有许多日本电报的原文。

国务院惊恐万状。应它的要求，陆军部派出三名军官前往沃辛顿向亚德利索回所有的官方文件。亚德利回答说，他没有任何“会伤害美国政府”的文件。

但在亚德利的代理人将手稿交给麦克米伦公司之后，政府却遂了心愿。纽约的助理检察长托马斯·E. 杜威取得了麦克米伦公司总经理乔治·布雷特的合作。二月二十日，美国法警从麦克米伦公司拿走了手稿。

出版公司参与阻止自己所收书稿的出版，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是，联邦政府以保密为理由没收一部手稿，却是历史上第一次。四十六年以后，《日本外交秘密》的部分内容仍未解禁。

为保证亚德利不再暴露秘密，国务院促使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发表任何用官方外交密码编写的材料均属犯罪行为。这项法律至今依然有案可查。

这一切遭遇都没有使亚德利因灰心丧气而退出作家生涯。他从撰写带点儿小说色彩的非小说类作品，转而创作有点儿事实根据的小说。在一九三四年创作的《美貌出众的伯爵夫人》一书中，他描写了华盛顿秘密机关的首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揭露一名漂亮的德国女间谍的故事。《星期六文学评论》写道：“亚德利先生熟谙间谍行当，可以讲出很动听的故事。”

六个月后，他又写成了《日本红日》。这次的主题还是间谍勾当和外交斗争中的阴谋诡计。书中描写了国务院一位年轻雇员同一名中国美人之间的儿女私情，而这种风流韵事竟然导致了侦悉日本征服满洲的阴谋。一九三五年，随着一部影片的发行，亚德利又获得了一次成功。米高梅影片公司将《美貌出众的伯爵夫人》搬上了银幕，片名《幽

会》，由威廉·鲍威尔、罗莎琳·鲁塞尔和凯撒·罗密罗主演，亚德利任技术顾问。

一九三六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含有凶兆的小麻烦。德军开进了非军事化的莱茵兰，佛朗哥又在西班牙发动叛乱。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写给美国驻法大使的信中说道：“人们不禁会感到，整个欧洲的形势比你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刻都黑暗得多。”

在东方，日本帝国已经行动起来。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入中国。到七月底，北平、天津均告陷落。后来又发生了上海大轰炸和南京浩劫。随着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步步后退和迁都重庆，美国人民对他的事业日益同情。总统也深表同情，但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日本的报复，因此美国除向陷入绝境的中国人供应军火之外毫无作为。

在这场很快变得越来越仰仗技术的战争中，蒋氏感到迫切需要更好的情报，尤其是更好的通信情报。他要求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查明：这一行中最有名气的天才之一——赫伯特·亚德利是否愿意重操旧业，运用他的魔术去破译日本的密本和密表。

这时，亚德利住在昆斯，正对房地产投机商的生涯感到厌倦。他的“密码头脑”渴求加密电报的挑战，而且双手发痒，总想去破译密电。因此，当中国副武官肖少校前来找他，邀请他去重庆时，亚德利激动不已。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讨价还价，迫使这位中国人将年薪加到一万美元左右。另外，亚德利还要求肖帮个忙——允许他把刚刚爱上的漂亮女士埃德娜·拉姆赛尔带到中国去。

二十年前，亚德利与埃德娜初次相识。那时，埃德娜

刚刚高中毕业，到设在纽约的“黑室”求职。她在那栋令人生畏的高级楼房门前紧张地踱了几个来回，最后才下定决心走了进去。现在，这位过去的上司和他的长期助手正在热恋之中。然而，尽管他俩难舍难分，肖还是不能同意亚德利把任何人带到中国去。

一九三八年九月，在同肖少校进行了几个月的秘密磋商之后，亚德利悄悄地溜出美国，并且化名赫伯特·奥斯本，伪装成皮革出口商，来到中国。他的上司是表情冷酷的戴笠将军。戴笠是中国特工机关的头子，绰号“杀人魔王”、“大元帅的头号打手”，全国都怕他。人们几乎从来不提戴的名字。据亚德利称，这位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有一次曾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上海策划暗杀他的仇敌之一——汪精卫。

亚德利抵达中国时，中国的“黑室”（这是亚德利后来对中国破译机关的称呼）过于分散，混乱不堪。它由一位神秘的中国官员漫不经心地领导着。他已经干了大约十年的侦收和破译工作，但是他与此项工作的关系在中国政府内只有一、两个人知道，而且也许从未向亚德利透露过。此人属下有五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总共约有八百人。亚德利首先力图将这些机构统一起来，并且希望最终成为这个庞大的新组织的头头。然而，此项改组工作旷日持久，叫人伤透脑筋。

重庆的夜生活远不是亚德利所习惯的那样丰富多彩。虽然东道主给了他一栋房子，人们还是经常看到他趴在重庆宾馆的牌桌上。重庆宾馆是政府为招待来华公干的外国人开办的。在那里，这位五十岁的皮革商同仍然逗留在战时重庆的几个西方人一道喝酒、打扑克、讲下流故事。他

的密友之一是乔治·施韦尔。此人在美国海军中当过兵，后来决定留在中国并在重庆开了一家店铺。

另一位密友是《时代》杂志的新记者西奥多·H·怀特。他二十三岁，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比亚德利晚五个月到重庆。后来，怀特因为写了一些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书而声名雀起。他专攻中国史，曾靠奖学金到中国旅行过，并且毛遂自荐，到蒋介石政府的新闻部当了一名顾问。他后来在《探索历史》（纽约哈泼劳公司一九七八年版）一书中回忆道，他这个顾问的主要任务就是“左右美国的舆论”。他还说，“美国对抗日的支持，是政府赖以生存的希望所在，因此对美国报界施加影响极为重要。他们认为必须对美国报界施展坑、蒙、拐、骗的伎俩，尽力促使美国相信：中国和美国的前途都决定于抗日。”

怀特很快就过腻了宣传家的生活，于是签约进入《时代》杂志社。在躲避轰炸和向纽约发稿之暇，他时常光顾重庆宾馆，在那里同亚德利一起消磨时光。他后来带着钟爱之情写到了亚德利：

“奥斯本”喜欢上了我。他这个人风趣横生、热情奔放、嗜酒、嗜赌、嗜女人。我们成了朋友之后，他想教我打扑克，让我站在他身后看他摊牌和吃进大笔赌注。他还觉得应当教我一点性知识，于是邀请一些他所结识的漂亮女士到他家中赴宴，试图劝我体验一下个中滋味。我不想学，因为我仍然强烈地怀念波士顿。不过，他确实教会了我一件事，它比我尔后从任何一位官方美国顾问或能人那里学到的东西都更重要，那就是在发生空袭时如何行动。亚德利的理论是，如果一

颗炸弹径直落到你头上，那就没救了。他说，空袭时的主要危险是窗户上炸飞的玻璃。因此，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该喝点儿酒，然后躺到长沙发上，身上压两个枕头——一个盖住眼睛，另一个蒙住下部。飞溅的玻璃会伤害这些重要的器官。如果眼睛或下部受伤，生活就没意思了。对于生活在原子弹问世以前那个时代的任何人说来，这都是金玉良言，于是我接受了他的忠告。象蒋介石统治下的重庆城里的许多长辈那样，亚德利待我极好。

头一年结束时，亚德利思乡心切，于是借酒浇愁，健康恶化，体重大减。此时，在那里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其中包括美国炮舰“土土伊拉号”上的军官）中，亚德利的真实身份和工作性质已成公开的秘密。

一九三九年夏，驻重庆的美国副武官戴维·D·巴雷特听到了传闻。他试图与这位捉摸不定的奥斯本先生接触，但是亚德利小心翼翼地避开他。最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巴雷特向陆军部军事情报处处长E.R.W. 麦凯布上校发了一份密电。他写道：“‘黑室’的亚德利是否已经离开美国？据可靠消息称，大约自五月二十五日以来，他或者干他那一行的另一个人一直受雇于国民党政府。”

军情处在整个三十年代一直密切监视亚德利的行踪，早就知道他在中国工作。鉴于亚德利是自由特务，而且美国当时又慷慨支持中国国民党人的抗日斗争，因此最好不要惹麻烦，也不要将此事通知驻重庆的使馆官员。不过，现在情况变了，于是陆军部就考虑要不要利用一下这个机会。

五天后，麦凯布致电巴雷特，通知他谣传属实，并且授权他极端秘密地与亚德利联系，“问一问能否将他的工作成果提供给你”。麦凯布指出，“我们对涉及军事问题的材料特别感兴趣。”此时，美国很怕日本，日益担心爆发太平洋战争，因此希望能从亚德利那里找到破译日军密码的捷径。然而，由于担心泄露后的巨大影响，麦凯布关照那位武官，“在涉及此事的无线电报中，即使是加密电报，均须特别谨慎。”因此，在巴雷特和麦凯布之间的其他任何通信中就再也没有提到亚德利的名字。

亚德利完全有理由小心行事。他的上司戴将军警告过他：不要同外国人，甚至也不要同本单位以外的中国人发生任何接触。亚德利也知道自己一直受监视。他在中国呆过一阵子之后，曾经请求并且获准享有一定的自由，但同美国大使馆的人联系则会招来麻烦。因此，巴雷特在五个多月以后才见到了亚德利。

戴笠很想知道那位美国外交官为什么经常要求会见亚德利。亚德利告诉他，作为美国公民，自然要不时地与美国大使馆联系。这样，亚德利就有了会见巴雷特的自由，尽管他们的会晤极有可能被人汇报给他的中国上司。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巴雷特同十分紧张的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首次会面。亚德利告诉巴雷特，他一直想在合同于三月三十一日期满后离开中国，可是现在改变了主意，只要条件合适，他愿意根据口头合同留下来。他还说，由他完全控制新近统一起来的“黑室”的可能性很大。

亚德利谈到了他在重庆这么多月中的紧张生活，并且告诉巴雷特，他希望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走访一下湖南和